

消亡中的原始人

[美]蒂莫西·塞弗林著

周水涛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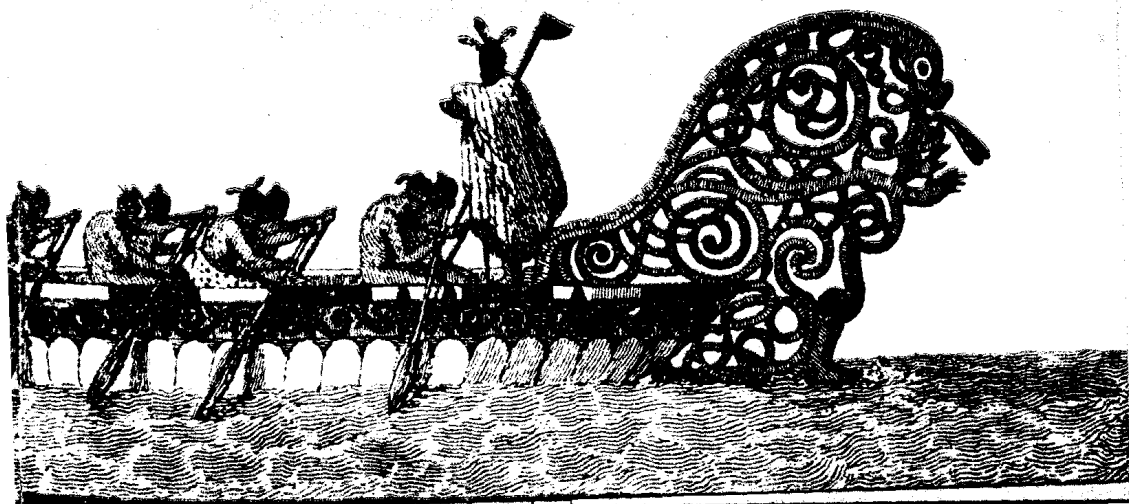
C912.4/42

消亡中的原始人

〔美〕蒂莫西·塞弗林著

周水涛译

東方出版社



THE HORIZON BOOK OF
VANISHING PRIMITIVE MAN

by

Timothy Severin

Foreword by Colin M. Turnbull

Published by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美国文化遗产出版社 1973 年版译出

消亡中的原始人

XIAO WANG ZHONG DE YUANSHIREN

著者 / 〔美〕蒂莫西·塞弗林

译者 / 周水涛

封面设计 / 马少展

版式设计 / 张嘉瑞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 10.625 字数 / 252,000

版次 /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 0,001—2,7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052-0 / C·1

定价 5.70 元

目 录

前言(科林·M·特恩布尔)

.....(1)

起源:导言.....(7)

1. 现存的石器时代(29)

2. 丛林幼童(62)

3. 金色卡斯蒂利亚的库

纳人(92)

4. 大洋的贵族(122)

5. “倒吸气音”的民族.....(154)

6. 北方的技术主义者(180)

7. 北海道的天国之民(209)

8. 食人肉者与传教士(234)

9. 拉普兰的滑雪者(264)

10. 马托格罗索的斯巴

人(291)

11. 迁徙、评价与哀伤(318)

DI14/20

前 言

科林·M·特恩布尔

人类能在生存竞争中获得成功，其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和愿望。对于我们来说，恰与猫科动物相反，会证实为致命的正是缺乏好奇心。但同样也可以说，好奇心如果受到过分的限制或选择，或者予以不恰当的满足，就会导致一种甚至更为十足、更为危险的无知，在这种无知状态下，我们会把得自有限事实的肤浅了解误认为知识，从而把纯粹的观察视同才学。最为确切地说，人类应该有好好奇心，特别是对人类自身的好奇心，但根本的一点是，这种极为重要的好奇心不仅应该因事实、而且应该因理解而得到满足；而且我相信，那就是人类学所企求的目标。

由于我们周围世界的开发，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人，都应该有能力以这样的认识去看一看其他一些民族、其他一些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新闻报道或电视纪录片都太短促了。尽管这些报道和纪录片也令人眼界为开，然而它

们绝大多数都是由那些可能亲临现场，但不可能花费必要的时间作深入研究的人们编制的。那终究不是他们的本业。结果，这些报道和纪录片以及我们因之而持有的见解便按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准则进行了组织。真切的理解于是不复可能，畅行无阻的则是那些赏心悦目的优越感，而过分浅薄的优越感是会导致偏执的。

就其本质而言，人类学并不作起源问题上的评价。它不仅观察人们所做的，而且还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才逐渐认识到，尽管别人所做的事情看上去可能离奇古怪，而实际上却是针对着一个完全并非离奇古怪的目标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原始人”的习俗貌似古怪，但是他不仅具有与“文明人”相同的许多目标，而且似乎能更容易、更有把握地达到这些目标，这一发现往往令人大惑不解。作为起题，我们只是要问一下，我们所谓“原始(的)”和“文明(的)”这些术语究竟含义何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首先要审慎地看待皮相的异国风物，因为那是一些经过描述的事实，要对过程、对确实正在进行的事情有所了解，以避免贸然妄加评价的潜在危险。于是，我们自己熟悉的经验领域所未及的那个陌生而往往又是令人不安的世界，便会变得大为熟悉，也不会是令人不安的。阅读另一民族的资料已成为最为令人激动的智力探险之一，因为这使我们在那些似是而非的摄影杂志中虚实相杂的空泛报道之外能有所获。在所有这一切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我们隐约认出了我们自身的影像，而不是目睹某些异国土著身穿因饰有羽毛和子安贝壳而显得辉煌华丽的长袍，或惹人注目地赤身裸体的丰采。

我相信，人类学真正的意义之所在，将是它使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有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人类学是从我们的生物学、我们的历史和进化，以及我们社会和文化的形态等诸方面来做到这一点的。由于社会人类学论述的是人们在社会中联合在一起以及为生

存而自发通力合作的多种方式，因而在如法兰西的孟德斯鸠和苏格兰的休谟这些伦理学家中便自有渊源，这些伦理学家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和他们极为显然地面临着危险。社会人类学的初衷，是致力于确立一种能更好地理解一个人自身所在社会的方法，然而我们却可悲地逐渐偏离了最为根本的目标，并且变得更为注重于这一方法本身了。实际上，这一方法和理论主体已变成了它们自身的目的，而那些我们进行实地研究时朝夕相处的人们有时也被视若纯属实验用的豚鼠。

这并不是说，现在已不再存在足够的余地进行较为侧重伦理的实地研究，以及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方法和完善我们的理论主体了，而是说，既有余地也有必要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并同时重新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作一考虑。无论如何，我们既不会解答所有的问题，也不能左右我们的社会结构以达到任何想望的目的。但是，我们在小规模社会（比“原始”一词较妥贴的用语）的社会进程上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这对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来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正如我们未曾听说会因看见了异国社会的外貌而沮丧震惊或洋洋得意那样，我们也不必因在我们自己的社会所见而动辄欣喜不已或厌恶有加。我们在实地研究时自问，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某一特定习俗的意义何在；当把同样的方法用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及其常有的奇风异俗时，我们可能就不大会光凭事物约略的表面现象而仓促地妄作评价了。

毫无疑问，无论从事哪一种分支学科研究的绝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会一致认为，尽管人类在表面上具有广泛而又辉煌的多样性，但人类的基本一致性却甚至更为显而易见。正如早期人类学上的发现曾被用来支持殖民统治并为之辩护、甚至用来向殖民政权表明如何更“有效地”统治那样，少数人已经、并且也许还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候利用人类学上的发现，来支持种族和社会方面的自我中

心论或支持唯知识论。但是，这显然要归咎于现行的哲学观点而非人类学本身。在今天，主要的争议在于人类学是否应该关心现代的西方社会，或者说，人类学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退回到它的知识的象牙之塔中去，同时在“纯科学”的名义下放弃所有的社会责任。

尽管如此，本书也许恰恰是由于并非出自一位人类学家之手，因而把人类学家们的发现不拘一格地用于最为切合公众以及整个社会实际的利益。为了促使读者从他自己经验的角度来为他自己解释作者笔下冷酷的科学事实，作者通过他本人的深思熟虑，把这些事实加以锤炼并作了生动的描写。

在阅读本书的某些描述，甚至在阅读一份取自我自己实地研究工作的报道时，我发现自己不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而得益匪浅，因为个人关于世界的经验无论有多广泛，也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举例说，在读到有关我自己的材料时，我注意到了以前所未曾注意的事物，因为作者对事实的运用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更有甚者，当读到有关那些我从未拜访过的地方的材料时，一种旧时的激动油然而生，它仍然令我隐约感到每当进入研究现场时出现的膝盖不大得劲的那种感觉。我很想知道，我究竟将怎样进行第一次交往，这种语言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是否会有哪一种共同的语言，或者，我是否会完全从头开始被当作一个婴儿来对待——教我谈话、吃什么、怎样吃、去哪儿，以及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书中异国情调的内容对我的吸引力仍然一如既往，但这不只总是由于内容本身。我之所以深受感染，毫无疑问是由于我此刻才懂得，一个民族不管看上去会显得何等的不可思议，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里有何等的令人厌恶，我也会在他们中发现我以前从未了解的我自身中一个新的部分。任何一位有心的读者，只要他自问一下，人们为什么要干这干那，只要他试图理解，

为了他们那个作为整体的社会，他们在追求什么，那么他就能分享这种自我发现之感。

但是，除了了解作为个体的我们自己以外，我们还应该对我们自己的社会，对它的目标和它的价值，以及它现在的方向作大量了解。类似决不是精确，甚至连比较也非轻而易举，因为，除了在技术方面，我们似乎进步甚微，于是结果也就常常令人气馁。本书中提供的某些报道表明，那种可能施加于许多人的伤害是不加思索地运用另外一些标准和准则的结果，这些标准和准则之所以被视为优越，只不过因为它们是我们自己的。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说教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看来也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我们非但不必为之沮丧，而且还应该就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及其指引我们的方向提出一些中肯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每一位读者也许比在任何其他方面更须有自己的见解。

甚至科学家们也常常把事实搞错，而且，科学家们的出名是在于他们就数据材料等的阐释所进行的漫无休止的争论。当然，他们没完没了的问题之一便是，任何人也永远无法完全肯定，明天将会有怎样一项可能推翻今天的所有解释的发现。在某些领域里，这种危险相对严重些。例如在人类学中，个别一项骨骼方面的新发现也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推翻现今有关人类起源的所有信念，虽然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历史日期和社会日期是有点模棱两可的，然而，即使完全是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工作的不同的学者，也几乎肯定会注意到不同的事物。在这方面，我是有亲身经验的。这并不意味着孰是或孰非；这意思是说，任何一位单独的观察者都必然有所偏颇、有所选择。任何一本科学专著都会象本书一样真诚地提出这一忠告，而对于一般公众而言，本书读来则远较大多数科学专著引人入胜。

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始(的)”一词(有的人宁可避免使

用这一单词)并不用于任何一种贬义的场合;带着这一认识来阅读本书,那么本书中所提供的报道就必定会引导任何一位读者走向赋予生命的自我发现之路,他在那里将会发现,“原始人”同我们根本不是俨然异类,而有关我们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如同我们的过去一样,“原始人”对我们都是大有教益的。

起 源：导 言

发现奥杜威峡谷的是一位捕蝶者。1911年，一位名字响亮的德国昆虫学家，卡特温克尔(Kattwinkel)教授，正热衷于在现今东部非洲坦桑尼亚灌木丛生的野外追踪一只蝴蝶，却被引到了一处地图上未加标注的峡谷口。一条陡直的地表裂缝展现在他眼前，那是一处古代的河床，差不多有300英尺深，25英里长，冲蚀而成的谷壁露出一层又一层岩石地层。即使是在这位未受过正式训练的捕蝶者看来，这地方也显然有着极为丰富的化石。卡特温克尔爬入峡谷下面，捡起一些骨骼化石并带回德国；在德国，当人们发觉这些化石是一些久已灭绝的动物的遗骸时，引起了一场轰动。一支德国考察队当即出发，前往探查这一新的发现，但是，这次考察工作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了。直到1931年，第一支由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组成的专业远征队才对奥杜威峡谷作了决定性的详尽考察。远征队的队员们立即认识到，他们

脚下也许就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化石产地——在古代，这里是离奇的史前动物群世代代的出没之处，以及如后来又得到证实的那样，这里可能也是人类祖先类人动物的家园之一。

奥杜威峡谷在某些方面堪称考古学家的理想境界。沿峡谷两壁到处显露的岩石地层展现出一个稳定而又异常全面的区域地质演化史。大为有利的是，这里的地质时间跨度几乎不折不扣地开始于约 190 万年以前的更新世初期，并延续了整个冰河时代的严酷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世界上动物的生活中发生了许许多多至关重要的变化。奥杜威峡谷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地质反常现象。夹在沉积岩层间的熔岩流层通常都位于古代的湖泊下面。这些熔岩带可以通过钾—氩技术作精确的年代测定；因而，奥杜威峡谷就成了年代最为确定的现存考古遗址之一，而那里的大多数化石骨骼也能非常确切地按它们恰当的年代范围加以认定。大自然首先用岩石来标下它的纪年界线，以后仿佛又不无周详地留下了化石骨骼，以确切地表明每一时期的层次存在过什么动物。然而，最为重要的却是通过奥杜威峡谷可以对人类的早期史有一个简略的概观。在 150 种以上不同种类动物的骨骼中，散布有很少——少得可怜——的人类和类人化石残片，这些遗存是那些曾经栖居在东部非洲这一地区，并据某些专家的意见认为是进化成了现代人类的类人猿或类人动物留下的。

在奥杜威峡谷发现的最为古老的猿人化石属于通常所谓的南猿属。这是一些大有可能冠以“人类之祖”的猿类，它们组成了一种不太确切的人科（类人）类动物，其遗迹在东部非洲、南部非洲、还有亚洲同样都已有发现。南猿的特征是直立的姿态、近于人类的牙齿结构以及相当于或大于大猩猩的脑容量，因而，直至解剖学家涉足这一领域之前，其归属不知怎么的总是游移于类人猿与人类之间。至少存在过两种南猿，而且两者在奥杜威峡谷都有发现，

鉴于这一事实，情况就变得复杂化了。体格壮实的一种重约 140 磅，站立高度约 5 英尺。由于这种南猿的牙齿相当粗大，很适合于咀嚼，所以看上去也许是一种食草动物。另一种南猿个子较小而且纤细些，约 4 英尺高，60 磅重。但是，若要以为这种小个子的外貌是不易生存的形态，那么就上当了。出现在这种南猿居住地点附近的击破的弱小动物残片表明，这种小个子南猿是一种食肉动物，据某些权威所见，也许甚至还捕捉和杀害其粗壮远亲中的幼小者和老弱者，只要力所能及。

大个子南猿与小个子南猿间的差别充分表明，当古人类学家们企图证实人类出现在何处以及怎样出现时，他们处于怎样一种为之困惑的两难境地。结果，对人类祖先化石的认识仍然一知半解，令人扼腕。象卡特温克尔的这种偶然发现，结果往往是继之以持续数年的辛勤工作，跪在那里用牙医剔子和驼毛刷子清除碎石，取得半抽屨的骨骼化石残片。例如在奥杜威，历时近 28 年的辛劳之后，方才发现了第一个人类头骨，而富有的赞助者们这时来取走了 7000 吨碎石，以抵偿他们开始时所给予的现金资助。由于这种证据的匮乏以及任何一项新发现耸人听闻的暗示作用，几乎没有哪一位考古学家能对人类从类人猿到现代人的出现过程所作的精确描写达成一致，这是不足为怪的。举例说，就两种南猿而言，它们是否是同一个种的成员，或者两者是否都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现在仍未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体重较轻、个子较小且食肉的南猿可能已进化到了人属动物的中间形态，而粗壮、食草的一种则显然已经归于灭绝。

问题的实质——及其魅力——是在于查尔斯·达尔文在 19 世纪中期才开创了人类进化的理论。自那时以来，这一理论确切的方向显然是漂忽不定的。在达尔文以前的时代，对这一概念作了鲜明而又令人安慰的简化，即人类在《圣经》中的创世日便以现

在的形态出现了——据一位头脑严谨的教会数学家的见解，那是在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的早晨。但是，在达尔文以后，有一点是日益显而易见的，也就是，人类进化甚至比这位伟大的进化论者所料想的还要复杂得多，其涉及面也广得多。实际上，要是说达尔文动摇了创世说者惬意的概念，那么当年轻的解剖学教授雷蒙特·达特 (Raymond Dart) 于 1924 年在南部非洲发现了第一块南猿化石时，就在学术界的李氏震级表上较低震级处刻下了差不多相同的震动标记。达特大胆地宣告，他已经识别出了“处于现存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一种已灭绝的类人猿”的一员。他在仔细检测了在南部非洲汤恩地方一处石灰石采石场发现的一个少年类人猿类动物头骨后断定，就某些方面而言，那就是缺环。那个头骨以及晚近在另外六个遗址、尤其是在奥杜威峡谷的发现无疑都证实，人类的历史远比以前所想象的古老，人类已在地球上存在了 200 万年以上，而不是 50 万年或早期估算的更短的时间。

当汤恩的发现出其不意地把考古学家的基线至少推早了 150 万年时，学者式的反应是直接注意所有现存的化石资料，并相应地加以重新分类。诸如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北方周口店发掘得到的北京人以及 19 世纪末发现的爪哇人骨骼这样一些有名的遗迹，都被重新划为一个新的居间集群，名曰直立人。似乎不妨可以假设，这些叫作直立人的动物很可能就是在这 150 万年的期间从南猿进化而来的。不幸的是，在最近的 30 年里，这一美妙的理论甚至也眼见得已经声名扫地。有关猿人化石的最新发现使认为南猿是直立人的直接祖先的观念受到了怀疑，因为若干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实际上比后期的南猿化石更为古老，其间并存交迭大约有 100 万年左右。

甚至更为令人茫然的是，人们发现，后期南猿的骨骼同其祖先相比，在体质上不是有了进化，而实际上是更为原始、更为退化了。

这一发现已经导致了某种假想，即认为南猿作为独立的一个支系已完全灭绝，而认作人类最早祖先者则应该从最近在奥杜威峡谷及其北方大约 500 英里处鲁道夫湖畔发掘所得到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人类化石中去寻找。在这些化石中，有一例显然与最早的南猿存在于同一时代，他们属于直立的类人动物，脑容量差不多有南猿平均大小的两倍。有关这些到处流浪者以及在许多方面都早已成熟的东非化石，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包括对奥杜威峡谷及鲁道夫湖的化石标本作仔细研究，搞清他们是否实际上也与之相关。热衷于这些化石的人们大概会主张，虽然人同类人猿是一个共有祖先的分支，但在进化树形图上与主干最为相近的不是得自奥杜威峡谷的能人（手灵巧的人）便是发现于鲁道夫湖的“1470 号人”（整编号码）。

毫无疑问，这一混乱主要是由古人类学家们自己造成的。每当一个新的考古学遗址揭示了一种新的宝贵发现时，幸运的发现者便有一种赋与他的发现以独一无二的特征的冲动，用堂皇的拉丁名称来为之命名，然后就为维护他的战利品的重要性而反对所有的后来者。雷蒙特·达特所遭遇的那种喧嚣仍然在其他战场回荡。有一支在南部非洲寻找化石的考察队，由于遇上了坚硬异常的岩石地层，竟至于诉诸炸药和岩凿，这是一种会使那些以使唤刷子和泥铲为能事的人们为之惊倒的爆破技术。首先发现了爪哇人的考古学家尤金·杜布瓦（Eugène Dubois）是位不幸的先驱者，他备受批评界的抨击，愤疾之余，把他无价的化石标本锁进了保险箱，寄放到荷兰哈勒姆的地方博物馆里，不见天日达 30 年之久。另外一些人类化石的境遇甚至更糟。在东南亚，过分热切的研究者们对任何一个能给他们带来一块化石的土著都答应给一点报酬，结果却听说，那些比较狡猾的土著居民把完好的头骨用锤子敲碎，来一块又一块碎片地换取更多的赏金。北京人的化石—— 16

块头骨连同一些颞骨、牙齿和所有其他发现——全部失踪，那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把这些化石和其他一些重要资料运离中国的高度安全的列车被日本军队所截获。这些珍品以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尽管石膏铸型侥幸得存）。

至少在要从进化的人类中寻找怎样的目标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们的意见是普遍一致的：那是一种直立行走的动物，具有人类的体质特征，如大的脑量、人类的牙齿型式、或者进化的头骨形态，以及显示出某种经学习而有的行为的迹象。某些判断尺度显然是受可获得的化石的类型所左右的。例如，牙齿的化石就尤为常见，由于牙齿因其珐琅质层坚硬而得以保存，因而整个考古齿科学派得到了发展，已能够从一个臼齿化石中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料。这样的检测工作可以有十分惊人的作用。在奥杜威峡谷的一次考察实例中，已有可能根据唯一的一块可以得到的化石——大脚趾尖的骨头——就一具南猿标本提供可观的信息。

按解剖学的标准，与南猿相比，生活在 40 万年到 100 万年前的直立人肯定更接近于现代人。就直立人的体质看来，其最为引人注目的进步是脑量有了明显的增大，平均值从南猿的 508 立方厘米增加到 974 立方厘米。这同黑猩猩的 498 立方厘米和现代人类的 1300 立方厘米可以作一比较。还有，顾名思义，直立人远为习惯于直立行走，站立着也更灵活。虽然直立人不太发达的大脑中枢并未让他有同样灵巧的手，但实际上他的躯体和四肢在结构上同现代人已非常相似。然而，尽管有这一不利方面，直立人却完成了一个显要的文化发明：正式使用火。在人类学家的密切注意下清理周口店洞穴的中国工人，发现了有着灰烬和烧焦的兽类骨头的地层，显露出古时炉床的点点痕迹，这表明，北京人不只用火来暖身，而且也许同样还用火煮食物。要是如达尔文所提出的那样，早期人类首先是在热带地区进化的，那么很显然，由于有了火，

也许还有衣着，可能已能够迁往寒冷的地区并在那里生存下来。在艰难的环境里生存并成功地适应环境的这种能力表明，人类是进化的获胜者而不是进化的失败者。实际上，到直立人存在的整个阶段的末期，直立人的居群已遍布匈牙利、东南亚、中国以及整个非洲大陆。

在某些人类学家看来，世界上主要种族间的差别就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形成的。在这以后的整个 20 万年里，各个地方的直立人居群缓慢地进化成为早期智人，同时保存了当时具有的地区性变异，诸如头骨的形状、身材、肤色等，并把这些变异作为种族特征固定了下来。这一观点已引起了另外一些专家的强烈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取自这一重要的变化时期的证据极为罕见。在从 30 万年前到 15 万年前的整个一段令人失望的时期里，化石记录只提供了六七个人类标本，其中有的充其量不过是几块碎片。这犹如被偶而一次灯光所照亮的活动景物，只是隐约一瞥人类在缓慢地走向现代的状态。而且，正如讨论南猿为直立人所取代时那样，由于交迭、矛盾之处太多了，任何人也无法精确划定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界线。直立人并未一律地变化成为智人的早期形态。某些地区的直立人似乎反而退化为更原始的形态，而另一些直立人，如在爪哇人中，则在很早的时期便以显然进步的智人特征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早熟。就以在罗得西亚发现的骨骼而言，看来人类的原始形态在那里延续的时间比其他地方更长，在其他居群已完全变为现代人后很久还与世隔绝地残存着。

然而，尽管直立人的分布范围极广，但人们对直立人的兴趣消减了，注意力重新又集中到大约 20 万年以前的时代，因为当时早期智人遍布整个古代世界，而且各个地区各不相同。在三四十个重要的考古遗址，已发现了 20 万年至 3.5 万年以前的人类骨骼，就这些遗址细加分析，便有可能区分出几种渐已进化的独特类型，